

內戰時期

「五·二〇」學潮的起因

• 賀江楓

作為國共內戰時期一次全國性的以「反飢餓」、「反內戰」為口號的學生運動，1947年的「五·二〇」學潮給國民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社會危機。學界將學潮起因多歸於戰後嚴峻的通貨膨脹及中共對學潮的引導^①。實際上，學潮之爆發是各種政治、社會、經濟因素疊加的結果。各大學的現實境遇千差萬別，各校誘發學潮的因素並不相同，參加學潮的利益訴求也不盡一致，但最終各種誘發因素都隨着「反飢餓」、「反內戰」的響亮口號呼嘯而出，組成了一股巨大的反政府力量。本文分析各種學潮爆發的誘導因素，考察它們對不同學校學潮爆發的影響，從而使得人們對於「五·二〇」學潮的認識豐富化、層次化。

「五·二〇」學潮之爆發是各種政治、社會、經濟因素疊加的結果。各大學的現實境遇千差萬別，各校誘發學潮的因素並不相同，參加學潮的利益訴求也不盡一致，但最終各種誘發因素都隨着「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呼嘯而出，組成了巨大的反政府力量。

一 中共、民盟政治勢力的介入

國共內戰期間，隨着中共大學基層組織的日趨壯大及領導方式的獨到，中共在大學國共較量中具有壓倒性優勢。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利用國民參政會積極倡導「反戰」，與會場外學生的反戰學潮交相輝映，學潮爆發有着民盟時隱時現的影子。

(一) 中共在學潮爆發中的作用

經多年發展，大學已成為中共革命的重要陣地。以北平為例，從西南回遷的「南系」與在日偽時期發展起來的「北系」兩線組織負責北平學生工作，兩者互不統屬，各自領導，又彼此合作。1947年，北平各校黨員及周邊組織已有相當規模，如北京大學有黨員125人，清華大學46人，燕京大學49人，北平師範學院34人^②。當中共決定引導學潮時，其組織力量可想而知。然北大沙灘校區三青團學生亦有143人，何以學潮能夠成為中共革命的利器，而不能成為國民黨反共的手段？三青團學生面對「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並不敢採取公然反對態度，「只能主張內戰責任在中共，至少要求停戰應向雙方要求。」^③

1947年3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吳玉章等：「一切帶全國性的政治鬥爭，應從參加這一鬥爭的群眾本身的生存問題上着想，有計劃的轉移到帶地方性的經濟鬥爭中去，以深入和鞏固群眾鬥爭基礎。」④隨着4月份國民政府對物價管制的失敗，糧食價格暴漲，上海局負責人劉曉4月28日向中共中央發電表示：「抗暴運動以後第二個高潮又將很快到來，五月份可能是這一新高潮的開始。這一高潮要比抗暴有更大的社會基礎，更廣泛也更堅強，配合全國軍事形勢的轉變。」⑤中共地下黨將採取「從生活鬥爭的不斷發展來突破」，「學生以增加公費，救濟清寒同學，保障學業，反對會考，自治會自由選舉，發展到反對借外債，打內戰，增加教育經費，擴充學校設備，提高待遇，救濟同學。」⑥而北平學委分析現實情勢後，認為一方面國民政府教育部朱家驊與陳立夫的「私鬥引起了公憤，增加了不少的間接後備軍」；另一方面中共的組織力量不斷發展，「抗暴後，民青的力量發展了，我們與後方黨領導的一般群眾組織交流了。讀書會、壁報等社團都有很大發展」⑦。

5月15日，清華大學中共黨員利用鐵路管理學院「復大」、北洋大學平部遷津之事，召開學生代表會議，以增加公費生為名，提議自17日起罷課三日，藉事宣傳。據警察局的報告，「當時會場內受共黨份子所操縱，罷課之議遂被通過，同時並通過標語四種：1、要求增加公費；2、提高教授待遇；3、停止內戰；4、責問公費用途。」⑧在得知清華罷課之後，北大中共地下學生隨即於16日召開學生自治會聯席會議，當晚決定回應清華罷課三日。17日北大召開全體代表大會，出席代表164人，議決「從19日起，罷課三日，並舉行遊行宣傳」，於是「北平學潮漸次延及北洋、師院、燕京、朝陽等校，成為本次學潮之序幕」⑨。

(二) 民盟等中間黨派的影響

民盟等中間黨派多為鬆散的政治組織，並無中共組織的嚴密性及強大的動員能力，然民盟成員多為社會賢達，影響力較大。中間黨派恰在5月18日學潮澎湃之時利用國民參政會發動「和平運動」，兩者同為反戰運動，其間有着若隱若現的聯繫。

中央大學起初的罷課，「是由民盟份子發起的這次的運動，使用的手段是鼓勵公費生要求增加菜錢，再鼓勵一般公費生要求增加公費」⑩。北平學潮則由「北平各大院校潛伏共黨份子鼓動風潮，並由民盟教授等為之贊助」⑪。而中間黨派的知名教授多在中大、北大發表演講，批評國民政府的內戰政策，這些都間或影響了學潮的爆發。據當時清華大學講助教聯合會負責人吳徵鑑回憶，各種支援學運的聲明等多是「吳晗、余心清、馬彥祥、崔月黎（晉察冀城工部學運負責人）在清華西院的吳晗家中以打麻將的形式進行詳細磋商，寫成初稿，然後以民盟名義拿出來，並與其他民盟的華北支部負責人劉清揚、張申府、張東蓀等人和其他民盟主要成員（如潘光旦、費孝通）商量定稿」⑫。學潮澎湃之時，6月2日全國性「罷課」、「罷工」、「罷市」口號的提出，最初係在北大學生代表大會上由「陳冠育（代表大會主席團主席，是民盟盟員，一般稱之為社會賢達）、曾憲邦（除夕社，代表大會主席團副主席）、馮遠程（民青、代表大會副主席）共同提出」⑬。

民盟等中間黨派多為鬆散的政治組織，並無中共組織的嚴密性及強大的動員能力，然民盟成員多為社會賢達，影響力較大。中間黨派恰在5月18日學潮澎湃之時利用國民參政會發動「和平運動」，兩者同為反戰運動，其間有着若隱若現的聯繫。



「五·二〇」學潮以「反飢餓」、「反內戰」為口號。

「六二計劃」一事至少可表明民盟的力量確實存在於學潮之中，然其影響若何，或許還有待更多的資料來求證。

二 苦悶下的吶喊

「五·二〇」學潮中，學生要求提高公費補助，改善現實生活。事實上，學生現實生活並非如宣傳所言「到了飢餓的邊緣」，更多為生活水準的下降。而學生群體在戰後動亂的局勢下，由於中共黨組織的運作及國民黨的腐敗，開始逐步向左傾發展。

「五·二〇」學潮中，學生要求提高公費補助，改善現實生活。事實上，學生現實生活並非如宣傳所言「到了飢餓的邊緣」^⑭，更多為生活水準的下降。而學生群體在戰後動亂的局勢下，由於中共黨組織的運作及國民黨的腐敗，開始逐步向左傾發展。當中共組織反政府學潮之時，內心憤懣的青年學生便隨之翩翩起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對學潮之原因曾分析道：「現時學潮有擴大之勢，一因經濟的壓迫遍及各校員生，一因內戰之結束無期，人心苦悶。」^⑮學潮的爆發可視作學生群體在當時苦悶現狀下的吶喊。

黃金風潮爆發後，惡性通貨膨脹的蔓延使得以固定薪金為生活來源的中間階層受害尤大。大學公費制度曾使學生生活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但此時學生生活水準也受到較大影響，之前較為優越穩定的狀態不復存在，學生對於政府的不滿徒增。然學生生活狀況惡化到何種程度？先前研究多以學潮的宣傳文獻為依據，如：「北大三院由於最近物價暴漲，自本月五日起改食絲糕，白開水一碗，青菜一碟，完全素食。本期開學時三院尚吃米飯，後改饅頭，今則吃絲糕，可謂每況愈下，同學們無不惶恐。」^⑯但筆者對這類觀點的客觀性有所保留。當時就讀於北大的羅榮渠對其生活費用多有記載，或可作為參考^⑰：

我們的伙食漲到了十六萬元了。本來膳團分家以後還有一個絲糕膳團，而我一向是愛吃絲糕的，但是，近來不知是胃弱呢還是有別的甚麼原因，忽然一下吃不慣絲糕了，只得吃米飯膳團，於是，本屆不但不退一文，反而還倒欠四萬元，由學校暫借。……前次麵粉錢領到十五萬元，但偏偏物價

就在最近大漲了一下。買皮鞋借世夫的三萬元還給他，買了一部《法國大革命史》花了二萬七千幾，一件襯衣四萬五千元，一雙襪子八千五百元；《懷疑論集》買得最便宜，只花了四千元；另外，築國借去兩萬元，於是十五萬元就告解決了。

由此或可看出，通貨膨脹對羅日常生活確實影響較大，但更多是生活水準的下降，而非食不果腹，否則也不可能有購書、添置新衣的預算。

當時的公費制度對學生生活仍有較大助益：「公費生之公費待遇，分食米與副食兩項。食米原定每名每日7斤計算，每月為二市斗一升或麵粉42斤。」^⑩事實上，即便學潮期間，北大學生仍有休閒生活，如羅榮渠所記：「下午，同築國、奇文去美琪看影片《長春樹》，因片子沒有中文字幕，劇情不太了了，加以精神不振，注意力難以集中，英語對白更加聽不清楚，就演技來說，還算不壞，尤其是那一對小演員，很有希望。」^⑪同樣，觀看電影也是中大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學潮暗流湧動的1947年4至6月，放映電影仍舊是計劃之事，各種放映費用包括宣傳費、招待費、運費等共計100萬法幣^⑫。由於票價不低，學生若看電影須有一定經濟能力，如食不果腹，恐不能有此活動。

戰後初期部分學生對國民黨充滿期待，如北大學生鄧世華所言：「生自小學畢業至中學八年淪陷生活，苦悶萬分，夜中偷聽後方消息，日夜期盼祖國勝利，在深夜時暗自流淚不能為國作事，對蔣主席之崇拜無法形容。」面對國民黨戰後的腐敗行為，鄧世華開始對國民黨產生不滿情緒，並向胡適表達困惑：「勝利後我們接收大員所表現的實在太不像話，簡直尚不如日人所統治時代。」^⑬以當時北平為例，北大、清華、燕大、北平師院及中法大學五校共8,047名學生中，承認新民主主義但不常參加實際工作和同情進步勢力的青年學生佔去近一半人數^⑭。當中共轉向引導群眾以現實鬥爭為主時，伴隨着強大的組織動員，同情中共的學生在現實的苦悶中自然容易響應。

部分學生政治觀念的「左轉」及現實生活的苦悶，使得國民黨與學生形成對立態勢。1947年5月28日燕京大學進行學生民意調查，88%的學生認為應該積極或者課餘參加學潮，69%的學生認為學潮至少表現了人民的要求，63%的學生表示學潮完全為自發之舉^⑮。學潮猶如蓄勢待發的火山，不可阻止。學生通過罷課遊行表達對國民政府及現實生活的不滿，實為苦悶下的吶喊，誠如國民黨要員張道藩隨後在中央政治委員會上所作的檢討：「目前一般人民及青年對本黨及政府已感失望，其原因在於我弱點太多，不能事事歸罪於共產黨，有若干黨外人士對本黨之批評或為本黨所要說而不敢說之意見。」^⑯

部分積極參加學潮的學校，如北平大學工學院、北平師院、上海交大等，實則由於教育部錯誤的院校調整政策，使其師生利益受到直接損害，此類學校不僅學生甚至教師亦在學潮中表現得較為激進，罷課風潮也較難平息。

三 難辭其咎的國民黨人

部分積極參加學潮的學校，如北平大學工學院、北平師院、上海交通大學等，實則由於教育部錯誤的院校調整政策，使其師生利益受到直接損害，此類學校不僅學生甚至教師亦在學潮中表現得較為激進，罷課風潮也較難平息。由於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期由陳立夫、朱家驊負責，朱陳二人在執政期間均大力發

展各自勢力，在各大學內安插親信，使得本身已受懷疑乃至抵制的院系調整，更有了國民黨派系鬥爭的痕迹。而國民黨向大學校園的滲透，本希圖與中共地下黨爭奪青年學生，然國民黨人又多囿於意識形態及其自身運動形式的拙劣，故學生對於國民黨及三青團多心存不滿。正是國民黨的錯誤政策與派系糾葛，使得此時大學內部矛盾逐步激化，直至「五·二〇」學潮風雲將起之時，隨着中共恰當的策略，最終都以「反飢餓」、「反內戰」的形式顯現出來。

(一) 派系糾葛與學潮

1947年「五·二〇」學潮爆發之前，上海交大及英士大學先後爆發了震動全國的護校學潮，可視為此次學潮之先聲。然學潮起因卻與國民黨自身的派系糾葛密不可分。

交大學潮起因於教育部廢除輪機、航海二系，然其背後卻是CC系與朱家驊系之間的矛盾。交大校長吳保豐作為國民黨CC系的重要組成人員，1926年經陳果夫、曾養甫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歷任中央組織部總幹事等職。自1941年起，任交大教務長的李熙謀更是與朱家驊關係密切。戰後交大逐步形成以吳保豐為首的校政派、以李熙謀為首的少壯派，原老交大教授亦組成元老派，三者彼此爭鬥制衡^②：

學校復員上海初期，李熙謀依靠朱家驊的支持，掌握了教務實權，還直接控制了校內國民黨三青團組織，企圖攆走吳保豐，自任校長。元老派既對朱家驊歧視上海交大不滿，也對李熙謀看不慣。朱家驊為了排除異己，奪取交大的領導權，長期以來剋扣交大的經費，造成學校經濟窘迫，交大實際開支每月需五千萬元以上，而教育部僅撥給一千萬元。教育部核准交大職員為423名，但支付薪水卻只發302名；至於工友薪水，也要短少70名。因此學校每月虧空約七千萬元。交通大學原有航海、輪機兩科，朱家驊為了排擠吳保豐勢力，飭令交大停辦航海、輪機兩科，並決定更改交大校名。消息傳來，交大師生員工極為憤慨，紛紛自動貼出抗議書和呼籲護校。而吳保豐為了要與教育部長朱家驊鬥爭，也想借助學生力量，因而靠近學生。

而中共交大地下組織「一致認為交大赴南京請願是勢在必行，但必須善於掌握鬥爭的策略，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爭取到一定的有利條件就及時停止去南京」^③。無怪乎《北平日報》對交大學潮評論道：「這場風波，可說是教部自己掀起來的。」^④

英士大學爆發學潮固然由於遷校之故，然其「側面的原因卻不簡單」^⑤，實為朱陳教育界之爭^⑥：

英大自朱家驊派楊公達為校長以來，乃陷於無政府狀態。楊氏並非辦學之人，熱衷官位，做了一年多的校長，在校內未住上二十天，若干老教授都走了，最近他已向教部請辭，外聞風傳繼任者仍是朱部長幕中一位做官的人物。英大的學生固然大失所望，即中央的要人如陳果夫，因為這學校是紀念他令叔的，平日愛護甚切，亦特別關懷，認為教部對英大大不關注，嘖有煩言，如是乎風潮起矣！

若從國民政府各部門負責的事務來看，陳立夫主掌國民黨中組部，學潮處理並不在其職責之內，蔣介石直接要求朱家驊和陳立夫二人負責處理，或說明蔣將英大學潮起因歸為朱陳之爭。

5月11日浙江省主席沈鴻烈向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行政院長張群、教育部長朱家驊請示英大學潮作何處理之時，蔣介石直接電示：「特知朱陳兩部長負責處理」^⑩。若從國民政府各部門負責的事務來看，陳立夫主掌國民黨中組部，學潮處理並不在其職責之內，蔣直接要求朱陳二人負責處理，或說明蔣將英大學潮起因歸為朱陳之爭。

由此可知，朱陳教育界之爭實成為上述兩校學潮爆發的主因。當「五·二〇」學潮開始蔓延全國之時，國民黨青年部的趙仲容5月18日在與徐永昌等黨政要人討論時局時，認為「起因於陳朱爭校之學潮實質為陳朱兩派互相抵制」^⑪。同樣，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6月4日召開第三次會議討論學潮處理辦法，認為「此次學潮最初發生於英士大學之要求遷校，繼以交通大學之要求增加經費。據聞英士大學之學潮係楊公達所鼓動，楊本人不願住金華，在校不滿。□〔原文缺字〕月交通大學所有經費，教育部種種留難不發，使學校當局無法維持，然同濟大學刻尚未到期，即先發經費，此事如果屬實，則教育當局實負其責任」^⑫。傅作義系的《平明日報》更對朱陳二人長期控制教育界指名批評，「政府方面似乎辦黨的組織與國家的教育就是他們兩位最有辦法，三十四年政府改組，組織部長朱家驊調任教育部長，而教育部長陳立夫調任為組織部長，目前教育界的多事已使朱家驊成了新聞人物。」^⑬

正是國民黨自身的派系糾葛，使得教育部門的政策很容易給人以派系紛爭的印象，政策的權威性也大打折扣；而CC系此時在教育界受到朱家驊系的打壓，更是直接利用學潮來實現其目的。如果在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此種派系紛爭對其政權穩定性或許影響有限，然在國共殊死鬥爭之時，派系紛爭無疑負面影響更大，「某一派打擊某一系，某一系又打擊某一派，玩火燒身。」^⑭

中共正是利用國民黨的內部矛盾，實現了對上述兩校學潮的領導，如中共對「五·二〇」學潮的總結所言：「運動證明，在學潮前夕，敵人的陣營內部矛盾必越多，我們利用矛盾發動鬥爭，取得勝利的機會也會多。運動的開始，是利用了CC與朱家驊派對學校地盤之爭。」^⑮在推動學潮開展的過程中，中共自身組織力量不斷發展，「使我們發動了群眾，組織了力量，擴大了影響，很快的轉入了反飢餓反內戰的偉大行列。」^⑯

（二）教育政策與學潮

部分參加學潮學校如北平師院的「復大」、北洋大學平部遷津等，都起因於教育部錯誤的院校調整政策，使得學校的整體利益受到具體損害。此類學校不僅學生抑或教授同樣積極利用學潮要求得到公平待遇。此外如山東大學、唐山工學院等由於待遇不公，也在「五·二〇」全國性學潮中積極參加運作。總而言之，正是教育部錯誤的不適時的教育政策，使得學潮範圍愈加擴大。

北平師範大學抗戰時遷往甘肅，戰後師生要求復員北平、恢復北平師範大學的建制，後教育部允許學校復員北平，但改稱為北平師範學院。1947年5月，北平師院師生發起「復大」運動，要求恢復學校的名稱和建制。運動得到廣大師生的熱烈回應和學校當局的大力支持，通過學校的批准和師長的支持，經過選舉成立了「復大委員會」，並推選了五名學生代表赴南京向教育部請願。然而政

正是國民黨自身的派系糾葛，使得教育部門的政策很容易給人以派系紛爭的印象，政策的權威性也大打折扣。在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此種派系紛爭對其政權穩定性或許影響有限，然在國共殊死鬥爭之時，派系紛爭無疑負面影響更大。

府各部門卻互相推諉，使得師院「復大」問題複雜化，學生罷課也遲遲不得解決。北平師院教授李長之更在報刊發文批評教育部^⑳：

北平師院之復大運動，方在進行之中，而觀教育當局之談話，則多少有失態處。如初則謂之有文理學院，不足稱為大學，實則以名論，現在師院何嘗有兩院？可見當局對全國教育狀況的了解尚欠充分。繼則高等教育司長謂此事當決於部長，而朱部長又謂須決於主席，我們見了這個報導，也真不勝感慨。

北洋大學平部本為北平大學工學院。1947年教育部要求該校遷往天津或併入北大工學院，此事引起大學師生的強烈反對。該校學生更罷課請願，表達對遷校政策的不滿。平部校友會5月26日電達國民參政會要求徹查教育部長，指斥：「朱氏尚欲自加解釋，謂係教育行政及制度，均經專家討論，如此專家，教育已臨破產，痛何言哉！」^㉑

無論是北平師院抑或北洋大學平部的罷課請願，都與教育部政策失當有莫大關係，如《平明日報》的評論^㉒：

追溯學潮的構成，一部分個別的原因，僅只是不甚重要的誘因，但也是政府製造的不平或者措置的失當，比如抗戰復員各大學均已恢復，歷史悠久成績卓越的師範大學，為甚麼大學二字也予而不予，師大師生如何能心平氣和！又如北平大學工學院，改組為北洋大學之一部分，其中是非已有定論，在現在物價昂貴經費困窘之時，又有甚麼必要拆掉北平的設備遷往天津？教部事前是否亦曾計算遷移改建所需的經費，與師生生活所受的損失？

教育部的錯誤政策成為上述兩校學潮爆發的直接誘因，連北平市警察局也認識到此點：「此次學潮發生之前，本市鐵路管理學院因要求復大，北洋平部反對遷津，曾已開始罷課，然僅各為本身關係，初無政治背景參與其間，迄至五月十五日共黨份子利用前聞各校罷課之罷課機會，遂提議自十七日起罷課三日。」^㉓正如國民黨的事後檢討所言：「學潮泛濫必須有藉口，而教部調整各校院系之命令，又恰逢其時，而又最能刺激學生。學潮既畢，殊值得檢討此種措施之利弊。」^㉔

恰在物價飛漲，教授、學生生活普遍艱難的情況下，教育部對各院校經費待遇的各種不平等，使問題擴大化。5月17日之後，山東大學回應全國大學罷課遊行，國民黨中央秘書處認為山大罷課原因重在：「山東大學教職員以二級待遇相差懸殊，曾電部籲請調整，覆電認為尚欠圓滿，五日罷教。同日學生自治會亦宣言回應，不速解決，恐將波及社會。該校此次罷教，意旨單純，無政治背景。」^㉕唐山工學院在5月15日爆發學潮，直接原因也是待遇不公，「政府對於唐山生活指數從未聞實地調查以改情形隔膜，歷次調整待遇均未得適當之標準。而駐在唐山之其他中央機關多有照平津區享受一級待遇。」^㉖而該校師生多次呼籲改變待遇政策，「竟未蒙當局之一諾」^㉗。無奈之下，該院師生只得罷課請願。

國民黨黨團不斷向大學之中滲透勢力，企圖加強控制教育界，並對中共的地下活動進行抵制。然其黨團成員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固執僵化，且組織活動形式拙劣，其黨團活動反而弄巧成拙，引起大量學生不滿，為學潮爆發添加了潛在因素。

(三) 國民黨黨團活動與學潮

國民黨黨團不斷向大學之中滲透勢力，企圖加強控制教育界，並對中共的地下活動進行抵制。然其黨團成員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固執僵化，且組織活動形式拙劣，人員素質難與中共媲美，其黨團活動反而弄巧成拙，引起大量學生不滿，為「五·二〇」學潮爆發添加了潛在因素。

1946年底「沈崇事件」爆發後，在中共的領導下，國統區爆發了大規模反美學潮。為與中共鬥法，1947年3月14日國民黨及三青團一手包辦發動了「反對國際干涉大遊行」，大呼反蘇反共。由於中共地下黨的積極措施，以及國民黨「黨團同志經濟困難，對無黨無派同學缺乏聯絡」，且「更缺乏工作技術之訓練」，除北大百餘人參加外，清華、燕大等校學生並未參加^④。清華學生因未參加此次遊行，竟遭受懲罪。3月15日，清華校車途經西單商場突遭暴徒百餘人攔擊，對車內師生二十九人橫加侮辱，並強迫司機將該車駛經全市示眾，「每至鬧市，暴徒即登台演說誣指師生為共產黨、漢奸」，而中央社竟對此事稱為「不愛國份子之精神懲罰」^⑤。3月16日下午清華學生鄭某又遭二〇八師士兵數人毒打，並口稱「你們清華大學都是共產黨，都是漢奸！」^⑥此種行徑自然引起清華學生巨大反感，學生自治會在致市政府的抗議書中直接質問政府政策的合理性，「一月以前，平市警察局曾通令禁止遊行，而此次竟由貴府發動遊行。政府公開毀法莫此為甚！」^⑦

兩個月之後，清華學生首先響應遊行號召，揭開北平「反飢餓」、「反內戰」學潮的大幕。朱家驊舊屬向大光就此事向朱氏評論道：「清華校車之校名予以更改，遊園學生無故受辱，徒足以表現其對方行動之幼稚，招致學生對於本黨發生不良反感，實對本黨為反幫忙。」^⑧

抗戰勝利後，部分學生對國民黨的觀感日趨惡化，此時學生內心本已極為苦悶，且生活水準受到物價暴漲的影響直線下降，而國民黨黨團份子非但不能採取積極措施未雨綢繆，反卻製造矛盾、煽風點火，頗有為淵驅魚之感。國民黨黨內的反省或更有說服力：「學潮之發生，雖有共黨之策動，然經濟危機嚴重，政治腐敗，一般中立學生，對政府由不擁護而走入對立狀態，實為主要原因。」^⑨

學生現實生活的苦悶及中共、民盟的運作使得此時的大學如即將爆發之火山；朱陳派系之爭或直接掀起部分學潮，或使院系調整凸現派系色彩，或制訂不恰當教育政策，都為學生發洩不滿情緒或中共引導革命提供了機會。

四 餘論

「五·二〇」學潮被中共譽為「第二條戰線」的開端，然其爆發確是多層合力的結果。學生現實生活的苦悶及中共、民盟的運作使得此時的大學如即將爆發之火山；朱陳派系之爭或直接掀起部分學潮，或使院系調整凸現派系色彩，或制訂不恰當教育政策，都為學生發洩不滿情緒或中共引導革命提供了機會，革命與現實的共舞最終促成了此次中共革命史上意義非凡的學運。而國民黨在學潮中喪失的不僅是社會秩序的安定，更是青年群體的人心。

北平基層警察認為^⑩：

烽火通地，物價飛漲，人們皆感受戰爭威脅和生活壓迫，青年學生是好動好奇，喜翻花樣，不明實際，精神敏感，易受刺激，因之青年學生行動不

免急躁，每一舉措輒易掀起群力，成為社會領導，況奸黨職業學生另有用心，時在乘機，惟恐社會不亂，各學校之動態醞釀於學生之心理作勢者，實為必然之理。

然歷史弄人之處或在於，國民黨高層因國共鬥爭的白熱化，僅看到中共的「煽動」，對學生的苦悶現實及國民黨自身的錯誤置若罔聞，直接影響其學潮對策。蔣介石認為：「奸黨為遂行其推翻政府奪取政權之意圖，……在後方各大都市則鼓勵風潮，擾亂社會，更無所不用其極。」^②任何反政府聲音都有可能被蔣介石推斷為中共的煽動，「下流之下，天下之惡皆歸焉。」^③正因對學潮起因缺乏客觀認識，國民黨在此次學潮中疲於應付，被動之至。隨後制訂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對學潮取嚴厲制裁態度，然學生在壓制之下更是逐步走向反政府的道路，國民黨人僅能空感學潮「消弭乏術，負疚殊深」^④。

註釋

① 代表性著作如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將學潮起因歸為中共的「煽動」；金沖及：《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北京：三聯書店，2002）認為學潮爆發在於學生生活的惡化及中共的領導。其他研究多沿用上述分析。胡素珊(Suzanne Pepper)著，王海良等譯：《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曾提及學潮可能與國民黨派系之爭有關，但未展開論證；施惠群：《中國學生運動史：194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認為上海交通大學學潮與朱家驊、陳立夫派系之爭密不可分，但缺乏深入分析。

② 〈北平學委半年工作報告〉，載共青團中央青運史工作指導委員會、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央檔案館利用部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47.1-1948.2)》（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頁473-500。

③ 〈關於北平反內戰反飢餓運動的補充材料〉，載《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47.1-1948.2)》，頁179-93。

④⑥ 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150。

⑤ 共青團中央青年運動研究室等編：《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檔案選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頁656。

⑦⑧ 北京市檔案館編：《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頁158。

⑧⑨⑩⑪ 〈北平市警察局向國民政府內務部報告北平學潮經過及處理概況書〉，北京市檔案館檔案，卷宗號：J181，案卷號：017-01151。

⑩ 〈從學生運動見教育危機〉，《中央日報》，1947年5月21日，第2版。

⑫ 吳徵鎰：〈先生學生是一家——記北平高校教職工的戰鬥〉，載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青春壯歌：全國五二〇運動親歷者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307。

⑬ 〈羅邁向周恩來報送北平學生運動概況報告〉，載《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47.1-1948.2)》，頁431-64。

⑭ 華北學生運動小史編纂委員會：《華北學生運動小史》，第一冊（出版地不詳，1948），頁115。

⑮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第八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947年5月16日，頁67-68。

⑯ 如李記松：〈略述北平學生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頁99-105。

- ⑰ 羅榮渠：《北大歲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1947年5月10日日記，頁117。
- ⑱ 安驥：〈公費制度之創立及其沿革〉，《教育通訊》（復刊），1947年第3期，頁10。
- ⑲ 羅榮渠：《北大歲月》，1947年5月22日日記，頁126。
- ⑳ 〈關於文體活動放映電影活動經費問題的來往函件〉，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卷宗號：六四八，案卷號：2532。
- ㉑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199-201。
- ㉒ 〈關於天津學運當前形勢任務及工作方針〉，載《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47.1-1948.2）》，頁630-48。
- ㉓ 〈燕大學潮民意調查結果〉，《平明日報》，1947年6月4日，第4版。燕大全校750人參與調查，610份問卷有效。
- ㉔ 〈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及中常會歷次臨時會議紀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卷宗號：一（2），案卷號：138。
- ㉕ 共青團上海市委編著：《上海學生運動史，194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81-82。
- ㉖ 浦作：〈我所知道的上海五二〇運動前後的情況〉，載《青春壯歌》，頁26。
- ㉗㉘㉙ 〈京滬學潮寫真〉，《北平日報》，1947年5月19日，第1版。
- ㉚ 〈關於1947年五·二〇前後各地學生運動情形〉，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卷宗號：二（2），案卷號：2304。
- 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八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415。
- ㉜ 〈吳練才抄送國民黨中政會委員為五二〇運動提出對付辦法函〉，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三編，政治第四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304。開會日期根據《王世杰日記》斷定當在6月4日，參見《王世杰日記》，第八冊，1947年6月4日，頁82。
- ㉝ 〈朱家驊〉，《平明日報》，1947年5月19日，第2版。
- ㉞㉟ 〈反內戰反飢餓學生運動初步總結〉，載《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47.1-1948.2）》，頁546。
- ㊱ 李長之：《李長之文集》，卷一（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頁412-14。
- ㊲ 〈夠傷腦筋的一紙電文，請參政會徹查朱家驊〉，《平明日報》，1947年5月27日，第4版。
- ㊳ 〈風波過了，留下的問題仍須解決〉，《平明日報》社評，1947年5月26日，第1版。
- ㊴㊵ 〈國民黨政府鎮壓四川學運函電〉，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五二〇運動資料》，第一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10。
- ㊶ 〈國民黨政府鎮壓山東大學學運電文〉，載《五二〇運動資料》，第一輯，頁249。
- ㊷㊸ 〈唐山工學院請求調整待遇〉，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卷宗號：二，案卷號：5356。
- ㊹ 〈陳長青抄送三青團策動反共反蘇遊行失敗請包函〉，載《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三編，政治第四冊，頁190-91。
- ㊺㊻㊼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致市政府抗議書〉，載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四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576-77。
- ㊽ 〈向大光關於黨政軍警對付學運方式的幾點建議致朱家驊〉，載《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三編，政治第四冊，頁161。
- ㊾ 〈北平市警察局公文保密簡要辦法、兩年來學潮處理辦法及義警組訓檔〉，北京市檔案館檔案，卷宗號：J183，案卷號：002-00160。
- ㊿ 秦孝儀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下冊（台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1978），頁457。
- ① 〈學潮評議〉，《革新》，第2卷第14期，1947年5月，頁7。
- ② 〈國民黨政府鎮壓上海學運函件〉，載《五二〇運動資料》，第一輯，頁154。